

现代

“经济人”

批

判

陈孝兵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F0
C590

现代

“经济人”

批

判

陈孝兵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F0
C5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经济人”批判/陈孝兵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1

ISBN 7—80636—764—0

I. 现... II. 陈...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029 号

现代“经济人”批判

著 者: 陈孝兵	网 址: 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 张慧君 刘晓宇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出 版 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红星印刷厂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邮 编: 030012	印 张: 17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 300 千字
0351—4922085(综合办)	印 数: 1—2000 册
E-mail: 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Jingishb@sxskcb.com (综合办)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引 言

在经济学的入口处,我们往往面临着许多两难的选择,例如,公平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就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知道,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规律,为了认识并掌握这种规律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需要针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形态,去抽象出一种由作为该社会主体的人形成的该时代所固有的“人的类型”。“人的类型”千姿百态,难以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自利”为本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就是当今现实社会的一种“人的类型”。因而,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系统阐述“经济人”思想,并用它来进行经济分析后,“经济人”就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入口或出发点。

一、“经济人”假定的源流

“经济人”假定最初来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表述。亚当·斯密基于爱尔维修的哲学或伦理思想而提出了“经济人”的思想,边际学派兴起后的马歇尔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追求者的见解。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之后,经济理性由经济理论的公理前提假设变成经济分析的真正的逻辑支点。可以说,“经济人”假定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几经锤炼,内涵得到了不断丰富。然而,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始终不曾摆脱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批评。有的学者根据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将“经济人”划分为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 and 新经济人等类型,也是不无道理的。

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

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却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影响,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经济分析中的这种自利性个人就是“经济人”。斯密第一个系统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并影响了几个世纪的经济学发展。斯密的“经济人”假定提出后,得到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及思想家的推崇和发挥。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在个人主义、经济自由等方面的论述对“经济人”假定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传承作用。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中,尽管没有像斯密那样明确地表述人的自利行为,但他“假定了一个经济人,他总是企图取得最大的利益……那位经济人在李嘉图书里过着在斯密的书里一样活泼的生活”。

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如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的,经济学研究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以发起“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为了满足纯理论研究的要求,对人的动机和行为分析有很强的工具性假设倾向。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哲学,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计算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而在数理学派那里,经济学更是被视为像“天体力学”那样精密的“社会力学”,人被当作力来看待,研究者关注的只是力的均衡和数量关系。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它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我们已不难体会勒帕日所说“经济人”在经济学中所起的范例作用。“经济人”思想的初步形成和运用为经济学的独立和诞生提供了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严格证明加速了经济学的严格科学化;而“新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发展则使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加里·贝克尔曾经指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它要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在以互相对立的目的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提出的资源配置和选择问题,都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均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切都是对“经济人”范例作用的有力证明。

由此可见,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因此只有从某种一致的动机或原因去解释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才能在理论上获得一个支撑点,从市场那纷繁复杂的表面经济现象中发现它所固有的内在秩序,从那表面的混沌无序中观察到实质上的有序。我们不能说“经济人”假说是绝对真理,但可以肯定其是迄今为止从事经济研究最有效的一种分析工具。

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自从“经济人”概念引进经济分析以来,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一是对“经济人”的非历史的方法论批判。这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马克斯·韦伯、韦纳·桑巴特等。二是对“经济人”过度抽象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批判。如,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和动机五层次理论,行为学派的“社会人”和麦格雷戈的“X—Y”命题。三是对“经济人”完全理性特征的批判。20世纪50年代,由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并由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而对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统一提出了质疑。这些批判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的缺陷。

针对有关“经济人”抽象脱离实际的责难,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所说的那样:“最好的假设并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

并具有尽可能大的解释与预见能力的假设。可以设想,要是没有这种假定,如果人们真的对于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坏一些,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很难提出任何有用的理论了。再说,任何理论结论总是建立在给定的前提或假定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前提或假定,并不一定永远地或完全地符合现实情况。牢牢记住这一点,就不会只想到结论而忘记结论据以推导出的前提,那么,碰到具体问题,就会灵活运用。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大体上不违反实际的假定和理论,应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经济人”在经济学发展中充当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我们不能将这一思想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一种为简化理论而做的假设,而是要把它看作是由一系列命题组成的以亚当·斯密传统为基础并不断发展的内容丰富的假说。它包含着许多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冷静思考,体现着他们对制度建设和社会秩序的根本看法。由于“经济人”假定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其与现实存在着一定差距,不断地受到一些学者的非难与批判,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在“经济人”假定问题上的多次激烈争论以至“论战”。正是在各种争论和批评甚至于非难中,“经济人”假定理论几经锤炼,获得了几次重要修正和发展,使这一假定不断地完善,并更加接近于现实。

首先是西蒙对“经济人”假定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突破与发展。西蒙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人”假设太理想化了。这是因为,要实现最大化原则,其前提条件是:(1)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前,拥有全部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2)理性“经济人”对每个方案所产生的结果都是明确的,这些结果能够按优先次序给以排列。(3)理性“经济人”在决策开始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效用函数,也就是说,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应具有充分的理性。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这些前提条件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化的假想之中。更何况人的选择或经济行为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人的理性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用西蒙的话说,就是任何一次对备选方案的选择,不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只能是一种满意的决策,或次优的决策,进而获得的只能是可接受的效用与满意利润。“经济人”实际上所寻找到和获得的并不是最优的决策

和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满意”(或“次优”)的决策和“满意”的效用或利润。因此,“有限理性”和“满意利润或效用”比“完全理性”和“利润或效用最大化”更接近于现实。

在人类行为分析上,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正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对其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使之更接近人类行为的真实状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固然具有“经济人”的本性,但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不仅限于物质财富,也追求非物质的(精神的)满足。因此,人既有利己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也有利他的一面(诸如扶弱济贫、献身公益等等)。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仍然认为,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也是源于“利己”的动机,譬如帮助弱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会得到安慰、追求道德完善和自己的成就感等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人”假定演化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强调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倾向,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旦有可能就试图破坏规则、钻空子、投机取巧。人的行为之所以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除了人的自私本能外,客观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也是重要的因素。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充分理性的,即每一个人都能准确地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应该怎么做,如何能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也同西蒙一样地认为,这种假定与现实相差甚远。也就是说,由于人本身的智力是有限的,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为虽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是有限的,有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样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假定,即人的行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从人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了人的行为特征,更贴近现实层次,进而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们的经济活动。

对“经济人”假定做出革命性突破和发展的,还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加里·S. 贝克尔、M. 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卢卡斯等著名人物。他们对传统的“经济人”作了重新解释,认为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怪物,而是有理性的个体;经济活动中的人,所追求的利益决非狭隘的金钱利益,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所定义的利益行动,即追求效用最

大。而效用来源可以是市场上的商品或劳务,也可以是声望、尊严等其他一些非货币因素。效用最大化动机的基础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人的基本偏好需要达到一种满足的过程。基本偏好需要决定了偏好需要的类型,偏好需要的类型相对稳定,并不因人因时或因地而异。偏好需要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资源,而资源的分配通过市场进行,这些市场能够有效地调整参与者的行为。根据对经济人的重新阐释,以贝克尔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成功地应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不同背景与场合下的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在贝克尔看来,政客也罢、知识分子也罢、经商也罢、从戎也罢、独身也好、结婚也好、利己主义也好、利他主义也好,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换言之,人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运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

在人类社会发展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经济人”假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尽管“经济人”假定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在对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活生生的人的经济行为的解释上,与现实有一定差距,但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本能及其逐利的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的“经济人”假定的“硬核”,在内容上是合理的,它与其他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学说相比,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本身就说明“经济人”假定的合理性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性。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制度空间下,我们承认“经济人”假定的客观性,肯定人的自利行为的普遍性,既不意味着人的自利行为必然导致恶,也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善。“经济人”的假定是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普遍所具有的行为特征的概括,即对在一定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类行为的一种原则抽象。因此,它对现实社会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也正因为如此,“经济人”假定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获得了广泛赞同和应用,并在各种批评和非难中得到补充和完善,进而推动着经济科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

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界定。这一假定理论不是教条式的“绝对真理”,而是对人的行为原则性抽象的“相对真理”。以“经济人”假定这一前提出发去分析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探究和说明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进而阐释经济过程因何发生、怎样发生。也正是“经济人”假定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惑,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引导人们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的自利行为能在客观上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如 A. 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遍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

三、经济学在衰落吗?

不可否认,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他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模糊难懂的理念、信条、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 20 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20 世纪 80 年代前,国外社科界曾有过“经济学帝国主义来了”的惊呼,反映出经济学这门学科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长足发展。在我国社科界,经济学也掀起过类似的波澜,眼下就有“谁都在谈经济学”的架势,经济学“扩张”的步伐势不可挡。现在主流经济学能够比较的不是相互争论的思想观点,不是研究视角,也不是结论的可证实性,而主要

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上,这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所在。而且,经济学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自称为最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因此极力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甚至是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经济学正在雄心勃勃地构建经济学帝国,即使还没有完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心态已经越来越浓重。经济学者努力排斥并贬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相反,却极力将抽象的最大化思路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结果,经济学的危机也越积越深,经济学越来越远离其他学科。在部分人的眼里,经济学似乎正在衰落,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像经济学了。

其实,这大可不必担心。经济学并没有衰落。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走自我循环、自我封闭的道路,经济学只有与其他学科不断交融,取长补短,才有发展的后劲。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19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and 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的“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这是经济学大家庭的幸事。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也没有必要刻意去为经济学贴金,让经济学贵为人上。事实上,经济学头上的皇冠并不是与身俱来的,我倒觉得有点自封的味道。M. 弗里德曼曾告诫我们,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暂时被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这一概括体系可以被用来对情况变动的影响作出预测。人类在扩展这一概括体系,增强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信赖,及改进其预测的精确程度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受到了下述两种因素的阻碍:一是所有知识探索的人类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二是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种桎梏。这些桎梏对于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来说影响极大,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一

经济学来说也特别重要。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对日常生活及对公共政策中大部分问题的重要性寄予了太多的热情,从而妨碍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并造成了科学分析与规范判断之间的混淆。任何生生不息的理论,不论它是经济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考虑到作为新理论来源的那些思想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新的理论会诞生。假设作为来源的思想原本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可能是在发展过程的高峰时得到一个不同的理论。换句话说,没有经济学的源流,经济学理论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必须凭信仰去接受他们,只有信仰之于经济学的前景才可能有意义。

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影响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并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第一章 “经济人”与经济学家/1

- 一、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2
- 二、历史性与科学性的变奏/5
- 三、庸俗化意味着什么? /9



第二章 “经济人”的内核/11

- 一、四大命题/12
- 二、利己与利他/17
- 三、“经济人”挑战经济学/22
- 四、超越“经济人”/26

第三章 “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设计/29

- 一、“经济人”的行为特征/30
- 二、“经济人”与制度正义的背离/32
- 三、“经济人”行为的制度设计/34
- 四、写给国有企业领导者的话/37

第四章 “经济人”与市场有限理性/44

- 一、市场是什么? /44
- 二、市场的有限理性/49
- 三、帕累托最优境界/55
- 四、理性的制度/59

第五章 “经济人”与制度创新/65

- 一、制度创新的方式与成本/65
- 二、历史的轨迹与制度诱因/71
- 三、亚制度形态:股份合作制/77
- 四、路径依赖与制度跃迁/92

第六章 “经济人”与政府规制/101

- 一、“经济人”的异化:准市场主体/102

- 二、政府的经济权威/113
- 三、企业对政府经济权威的侵蚀/118
- 四、政府失败/123
- 五、间接调控与预期/125
- 六、重建政府的经济权威/131

第七章 “经济人”理性的道德基础/141

- 一、“经济人”的信用道德/142
- 二、“小生产情节”的道德境界/148
- 三、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道德维度/158

第八章 “经济人”与人力资本投资/172

- 一、人力资本及其特性/173
- 二、人力资本的制度绩效/176
- 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配置/181
- 四、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183

第九章 “经济人”与经济发展/187

- 一、发展理论的多维嬗变/188
- 二、发展三要素：经济、社会与“经济人”(人)/194
- 三、激进与回应/206
- 四、发展的未来/212

第十章 “经济人”背后的反思/217

- 一、“经济人”与经济学帝国/217
- 二、在数学与经济学之间/221
- 三、实验室里的故事/227
- 四、新“经济人”/235
- 五、回到斯密吗？/242

主要参考文献/256

第一章 “经济人”与经济学家

经济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往往与其方法论密切相关。自从 18 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一直依靠“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以各种方式参与市场的人们行为，并由此对自由交易制度的有效性作了缜密的推论。实际上，“经济人”假设有其局限性，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几经锤炼，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拓展，其间也遭致了各个方面的攻讦，但始终保留着“自利性”这一基本的规定性。现在看来，它只是揭示了人类经济生活一个很小部分的规律，不可能一般化到人类经济生活的全部，它只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上的进步。

一、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

英国早期经济学家伯纳德·孟德维尔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认为,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时,若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其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增进社会整体的繁荣,其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要大得多。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后来,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己主义是人类自然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东西吧,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他从人的经济行为具有利己性出发,进一步指出,每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尽管个人通常不打算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尽力达到了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正是由于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会无意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达到的效果还大。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的基本内容是:(1)“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3)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

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认为,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假定是没有人的“完全理性”甚至“理性”之假定的。斯密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进行的,“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或“理性”,只是后来者对“经济人”假定的补充或认识罢了。

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西尼尔提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和约翰·穆勒明确给出“经济人”的概念,是对“经济人”假定的一次重要提炼。在西尼尔经济理论中,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归纳出四个前提并对它作了解释。在这四个前提中,第一个就是关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人的欲望是以尽可能少的牺牲获取更多的财富。西尼尔自己认为,他没有把经济分析建立在假定的前提基础上,而是使其依赖于不多的几个基础性的命题。但这些命题不需要证明,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西尼尔所说的前提实际上就是公理。如果说在西尼尔那里是把追求财富的“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作为不证自明的常识来使用的话,那么约翰·穆勒则明确地给出“经济人”的概念。穆勒1844年发表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书中提出应当把人的各种活动的动机抽象出来,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人”做出界定,使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在穆勒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认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情欲或动机完全抽象化。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的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要前进必然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所阻止的话,这种欲望所生产的行动是什么?因此,穆勒的“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约翰·穆勒的“经济人”概念比后来的马歇尔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所采用的“经济人”概念的含义要狭窄一些,他不考虑那些通常属于经济学考虑范围的非经济动机。